

俗情蕴诚意 雅文彰功德

——吐蕃攻占河西时期的敦煌碑文

朱 利 华

(嘉峪关长城保护研究所, 甘肃 嘉峪关 735100)

摘 要: 吐蕃攻占时期的碑文, 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文学价值也很高, 是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典型的雅文学作品, 代表了吐蕃攻占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 吐蕃攻占河西时期; 敦煌碑文; 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K877. 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20(2011) 06 - 0015 - 05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吐蕃攻占河西时期的碑文近 10 篇^①。这些碑文, 是记载当时人物的重要传记资料, 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河西历史、文化、宗教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碑、文尚存的有《大历碑》(P. 3608 卷、P. 4640 卷、P. 6203 卷、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 仅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有七篇《吴僧统碑》(P. 4640)、《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P. 4638)、《阴处士碑》(P. 4640、P. 4638)、报恩吉祥之窟记(P. 2991)、《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Dx. 1462 + P. 3829)、《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P. 2765)^②、《莫高窟塑画功德记》(P. 2991v), 这些碑文的碑石虽已不存, 但是据碑文内容可推知与之相应的洞窟, 并推断出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和历史背景, 如《吴僧统碑》是第 365 窟功德碑、《阴处士碑》是第 231 窟功德碑。

这一时期的碑文都是修窟造寺的功德记。

功德主都是当地的世家大族、高僧大德和任职当地的吐蕃官员, 把持着当地政治、军事、宗教等各界势力。窟寺既成, 都要刻石立碑, 以求其功业不朽、流芳后世, 正所谓“非石何以表其贞, 非文何以记其远”。所以, 碑文的撰写都很庄重、严谨, 是学者研究当地大族世系以及历史事件的可靠的文献资料; 又由于撰写者都是当地最具才华的官员、文人, 这些碑文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代表了当时河西地区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是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典型的雅文学作品。

《大历碑》是敦煌莫高窟第 148 窟功德碑文, 分别见于 P. 3608 卷、P. 4640 卷、P. 6203 卷、敦煌莫高窟 148 窟碑。P. 4640 卷, 题为“陇西李家先代碑记”, 署“杨绶述”该卷碑文未抄完, 仅存序文部分, 起自“敦煌”, 止于“东自”, 共六行一百四十字; P. 6203 卷前残, 存三十行; 敦煌莫高窟 148 窟前室南厢之碑北

收稿日期: 2011 - 02 - 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批准号: 10YJC751138)。

作者简介: 朱利华 (1976—), 女, 四川岳池人, 研究方向: 敦煌文献文学、河西历史文化。

向碑额题为“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P. 3608 卷题为《大唐陇西李氏修功德记》，署“节度留后使朝议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兼侍御史杨绶述”，于各卷中最为完整，尾题“时大历十一年龙集景辰八月旬有十五日辛未建”。可知碑主为李大宾和他所代表的李氏家族，碑文作者为“节度留后使朝议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兼侍御史杨绶”，因作于大历十一年，故简称“大历碑”。本文分以下几个部分：首先介绍洞窟所处地理环境，“敦煌之东南，有山曰三危。结积阴之气，坤为德；成凝质之形，艮为象。峻嶒千峰，磅礴万里。”以雄浑的气势领起全篇，突出所建洞窟的神圣庄严。“东自陇坂，旧陌走狐兔之群；西尽阳关，遗邑聚豺狼之窟”，渲染出吐蕃攻占时期河陇地区的荒凉气氛，凸显出碑主建窟之举的无量功德。其次介绍碑主的家世渊源以及建窟缘由，据 S. 2052 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李姓为渭州陇西郡十三姓中首姓，碑文中提及李大宾为“兴圣皇帝（西凉武昭王李暠）十三代孙”，六代祖宝为“随使持节侍中西陲诸军事镇西大将军领护西戎校尉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玉门西封邑三千户”，曾祖父李达为“皇敦煌司马”，祖父李操为“皇大黃府车骑将军”，其父李奉国为“皇昭武校尉、甘州和平镇将”，李大宾本人则是“朝散大夫郑王府谏议参军”，家族中其他成员也分别居于当地政界、军界、佛教界的重要位置，可见李氏家族在河西地区的显赫地位。“难兄令弟，卓然履道之贤；翼子谋孙，宛而保家之主”，希望家族子孙永保家族荣耀，这是建窟的主要原因。接着介绍所建洞窟的具体内容及壮观气势：

初坯土涂，旋布错彩。豁开石壁，俨然真容。卒自不生，示生于千界；今则无灭、示灭于双林。考验寻源，备物象设。梵王奔世，佛母下天。如意圣轮，圆转三有。不空妙索，维持四生。人其报恩，天则请问。六牙象宝，摇紫佩以栖真；五色兽王，戴青

莲而捧圣。十二上愿，列于净刹；十六观门，开于乐土。大悲来仪于鹫岭，慈氏降迹于龙花，丕（哉）休哉，千佛分身，聚成沙界；八部敷众，重围铁山。希夷无声，悉宰欲动。尔其簷飞燕翅，砌盘龙鳞；云雾生于户牖，雷霆走于阶陛。左豁平陆，目极远山。前流长河，波映重阁。凤鸣道树，每韵苦空之声；露滴禅池，更澄清净之趣。^{[1]210}

描绘出一幅窟檐洞构气势恢弘、佛像壁画华美精致的壮美景象。最后介绍洞窟建成之日来宾庆贺情况及作者撰写本文的原因：时任河西观察处置使的周鼎带着浩浩荡荡的随从，“隐隐辚辚，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僧俗两届的李氏家族成员也齐聚一堂，呈现出一幅热闹非凡的庆贺场面。

该文创作之际正是沙州城已被吐蕃大军重重包围的危急时刻，李氏家族选择在此时建窟，就不仅是借助佛教来弘扬家族精神，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感情。追溯先祖，历叙功业，既是为了体现家族生存发展的光荣足迹，在外族威胁下，又是民族精神的不屈传承。该窟首次出现了以《报恩经变》为题材的壁画内容^[2]。在儒家文化中，忠君和孝道两种观念紧密结合，与此思想相通的佛教中的报恩经变也成为这一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新题材，报恩思想也成为这一时期所修建洞窟的主要内容。“以慕祖宗之贞，不坠于家风；领孝悌之徒，修身于后代”（P. 2991 卷《报恩吉祥之窟记》），表达了敦煌民众不忘唐朝、不忘祖根的坚强信念。吐蕃的传统与此大相迥异，《旧唐书·吐蕃传》载“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后”；对待唐朝俘虏则是“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元稹《缚戎人》），因此以报恩思想为题材，表达了对吐蕃野蛮暴行的无声抗议，集中体现了敦煌碑文中的家族精神和民族精神。

《阴处士碑》是第 231 窟功德碑碑文，分

别见于 P. 4638 卷和 P. 4640 卷, P. 4638 卷题为“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 未署撰者姓名, 尾题“岁次己未四月壬子朔十五日丙寅建”, 可知创作于唐文宗开成四年己未(839), 时为吐蕃统治河西后期; P. 4640 卷题为“□□士碑”, 据 P. 4638 卷补为“阴处士碑”, 署“窦夫子撰”, 即当地大儒窦良骥所作, 碑主为阴嘉政和他所代表的阴氏家族。这篇碑文与《大历碑》风格接近, 但是由于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 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和人物精神面貌又有不同。文章开篇云“天成厥壤, 允姓曾居。地载流沙, 陶唐所治”, 允姓为古代部族名, 阴戎之祖; 陶唐氏为传说中由尧领导的远古部落名。文章将沙州的历史追溯到遥远的远古时代, 暗含这里早就是汉人祖先居住的地方, 具有厚重的历史归属感。“据五服而为郊”, 铺展开一望无际的广阔地域, 而沙州就处于“开一门而展掖”的重要位置。接着历述家族渊源和家族人员现状。此时虽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 仍然追溯祖先在唐朝的任职, 体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据 S. 2052 卷《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所载, 阴姓“隋唐以来, 尤为望族”, 敦煌阴姓“其先源为南阳新野人也”。碑文中叙述了阴嘉政的父亲阴伯伦的一段经历:

皇考, 三品荣门, 九皋闻远; 青襟小学, 紫绶当年。先成镇守之功, 竟保敦煌之业。属以五色庆云, 分崩帝里; 一条毒气, 扇满幽燕。江边乱踏于楚歌, 陇上痛闻豺叫。泉声未殄, 路绝河西; 燕向幕巢, 人倾海外。羁维板籍, 已负蕃朝; 歃血盟书, 义存甥舅。兄黑爱子, 拆襁褓以纹身; 鸳鸯夫妻, 解鬟钿而辮发。岂图恩移旧日, 长辞万代之君; 事遇此年, 屈膝两朝之主。自赞普启关之后, 左衽迁阶; 及宰辅给印之初, 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承基振豫, 代及全安。六亲当五秉之

饶, 一家蠲十一之税。复旧来之井赋, 乐已忘亡; 利新益之园池, 光流竞岁。^{[1][P71]}

以整齐的四六骈句, 优美流畅地叙述吐蕃攻占敦煌后实行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包括习俗吐蕃化“兄黑爱子, 拆襁褓以纹身; 鸳鸯夫妻, 解鬟钿而辮发”; 拉拢当地大族进行联合统治: “自赞普启关之后, 左衽迁阶; 及宰辅给印之初, 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嘉政本人则“承前永业”、“丰年镇积”, 其弟妹们或为僧尼大德, 或为吐蕃官员, 可见阴氏家族是吐蕃利用世家大族巩固统治的最典型的例子。

当地汉人修建洞窟并撰写功德记的习俗对吐蕃统治者也有影响。敦煌遗书中保存了镇守当地的吐蕃官员亲自主持修建寺庙的功德记: 《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 是尚起律心儿修建敦煌尼寺——圣光寺的功德记 《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 是董勃藏修建敦煌“城东三里平河口侧”“故坏伽蓝一所”的功德记。史载“吐蕃国法, 不呼本姓, 但王族则曰‘论’, 官族则曰‘尚’。”^③尚起律心儿的家族是“弼承大业、世禄良家”, 其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吐蕃高官, 其父尚赞摩, 参与了对河西的攻占, 曾试图以银盘礼品收买肃州刺史刘臣璧^④。论董勃藏的祖父、父亲也都曾担任军事首领, 参与了对唐、勃律国、回纥等国的军事外交活动, 论董勃藏本人也曾于太和六年(832)作为友好使者奉使唐朝。以上二人都出自吐蕃显赫的家族, 本人又都是曾在敦煌为官的吐蕃人。特别是尚起律心儿, 敦煌文书中也写作尚绮心儿、尚乞心儿, 《功德颂》云:

统六军以长征, 广十道而开辟,
北举撚枪, 扫狼山一阵; 西高太白,
破九姓胡军。猗猗□边, 逐贤王遁窜;
单于帐(帐)下, 擒射雕贵人。^⑤

他为吐蕃建下卓越战功, 而且与沙州关系极为密切, 曾经直接参与了攻占沙州的战役, 并成

为攻占沙州后第一任镇守官员。《新唐书·吐蕃传》载“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首题“大蕃右敦煌郡布衣奚□撰”，作者当为奚骥，敦煌遗书中又写作奚良骥、奚夫子，《吴僧统碑》、《阴处士碑》都是他的作品。《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虽未署作者，但行文格式与文章风格与奚骥所写功德文接近，可能也是他的作品之一^[2]。吐蕃统治者修建寺庙并请人撰写功德文，反映了吐蕃攻占时期吐蕃人对汉文化的吸收。

创作于吐蕃攻占时期的敦煌碑文，是敦煌文学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文体之一。作为敦煌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其政治、文化、宗教、历史、宗族、民族关系、风俗习尚及石窟营建、佛教艺术等方面的价值早已为学者们所认识，并有丰富的成果问世。但在文学价值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敦煌俗文学的关注，敦煌碑文作为敦煌雅文学的一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⑥。从以上对吐蕃攻占时期碑文的论述，我们得知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创造了优美动人的意境，具有诗意之美。《大历碑》云“依然地居，查出入境。圣灯时照，一川星悬”，读来仿佛目睹三危山下那灿若星辰的盏盏佛灯，身临于飘渺灵动、恍若仙境般的莫高窟夜景之中。《阴处士碑》中描绘壁画之美“化身菩萨，馨馨石钵之食；满愿药师，湛湛琉璃之水。轻纱浅绿，对细雾而未开；重锦深红，本无风而似动。”呈现给读者的有钵中之食的馨香，有琉璃般澄净、若隐若现的流水，有或朦胧或鲜明的绿纱红锦飘然欲动，充分调动起读者的味觉、听觉和视觉，使人对佛国世界的无比美好之情油然而生。其作用虽是歌功颂德，思想内容难免流于虚浮、空洞，但却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其次，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句式整饬、音韵和谐，具有形式之美。这两篇碑文开篇都以韵文点出莫高窟所处地理位置，在宏大的气

势中，为全文奠定庄严神圣的基调。正文分为散文和韵文两大部分，散文交代事由，韵文展开铺叙、描摹情状，韵散结合，层次分明，思路清晰。韵文部分时而四言、时而六言、或四六言间用，两句最后一词平仄押韵，读来抑扬顿挫，极富乐感。如《大历碑》：“时有住信士朝散大夫郑王府谘议参军陇西李大宾，其先指树命氏，紫气度流沙之西；刺山腾芳，鸿名感悬泉之下。时高射虎，人望登龙。开土西凉，称藩东晋。”

第三，适当用典，使碑文具有风格含蓄、典雅，语义丰赡之美。如《阴处士碑》：“壁峻毗耶，岩深檀特”，毗耶，古印度城名，维摩诘居士住毗耶城，释迦牟尼曾于该地说法；檀特，释迦牟尼成佛前曾在此地修行。将莫高窟所处的山壁与佛教中著名的毗耶城和檀特城相比，赋予莫高窟更丰富的佛教内容和更神圣的佛教情感。又如夸赞阴庭诚“师经避席传授，次于曾参；师尔凭河，好勇于子路”，运用了“曾子避席”和“子路好勇”的典故，在赞美阴庭诚具有尊师的美德和好勇伉直的个性的同时，还使文章充溢着浓厚的儒家思想。

由以上可见，创作于吐蕃攻占时期的敦煌碑文，在艺术手法上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碑文的固有特色，如典型的碑文体散韵结合、使事用典等。在思想上，由于碑文乃是建造佛教石窟的功德文，所以具有浓厚的佛教思想；同时还具有传统的儒、道思想，如“敦煌之东南，有山曰三危。结积阴之气，坤为德。成凝质之形，艮为象”（《大历碑》）是道家思想的体现；阴处士“入为孝悌，出整纲宗。旧制封官，近将军之裂棘。先世贤禄，以都护之同堂”，是以儒家为标准的处世之道。由于处于吐蕃统治之下，该时期作品在内容上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复遇人经虎噬，地没于蕃。元戎从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势”（《吴僧统碑》），是沙州城被吐蕃攻陷的描述，“兄黑爱子，拆襁褓以纹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辨发”（《阴处士碑》），是实行吐蕃的风俗习惯。总之，吐蕃

攻占时期的敦煌碑文，反映了吐蕃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内容，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上，都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代表了该时期雅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

注释：

- ① 本文所说的“吐蕃攻占河西时期”，是指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吐蕃开始攻掠凉州，至大中二年（848）张义潮收复河西这一时期。本文讨论的主要是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碑文，不包括《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现存敦煌市博物馆）等不载于敦煌遗书中的碑文。
- ② 原编号为 P. 2765 卷，后归入 P. T. 1070。
- ③ 《通鉴考异》二十一引《国史补》。

④ 见 P. 2555 卷《为肃州刺史刘臣壁答南蕃书》。

⑤ 见 P. T. 1070 卷。

⑥ 见吴浩军、朱利华《论唐五代敦煌碑文的文学价值》，待刊。

参考文献：

- [1] 唐耕耦，陆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 [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 [2] 史苇湘. 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 [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72.
- [3] 李正宇. 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两残卷的发现、缀合及考证 [J]. 敦煌吐鲁番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251.

The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Dun Huang Ancient Literature Scrolls in Tibetan Captured Hexi Period

Zhu Li - hua

(The Great Wall Prote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Jiayuguan ,Jiayuguan ,Gansu 735100)

Abstract: The inscriptions of Tibetan Captured Hexi period has not only a high historical value but also literary value. It is the typical elegant literature works preserved in the Dunhuang ancient literature scrolls and it represents the highest level of literary creation during that period.

Key words: Tibetan Captured Hexi Period; Dun Huang inscriptions; Literary value

[责任编辑：朱耀善]